

智者·长者·史家<sup>①</sup>

## ——王蒙后期小说创作心态考察

尚新磊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王蒙后期的小说创作背后有这样三种潜在的心态:智者心态、长者心态和史家心态。智者心态使他降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长者心态使他看透了代际隔膜的悲哀,而沉重的史家心态则使他的书写在当下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这三种心态构成了晚年王蒙一套成熟的心态结构,制约着他的小说的话语与叙事。

**关键词:**王蒙;王蒙后期小说;创作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5-0074-04

## A Wise Man, An Elder Man, A Historian

## ——An Mentality Analysis to Wang Meng's Later Writings

SHANG Xinlei

(College of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mentalities behind Wang Meng's later novel writings. They are the mentality of a wise man, the mentality of an elder man and that of a historian. The mentality of a wise man lowers his spiritual level as an intellectual; the mentality of an elder man makes him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sadness from the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generations; while the mentality of a historian embarrasses his writings. These three mentalities constitute a set of mature attitude structures in his later life, which manipulate and restrict the discourse and narration of his novels.

**Key words:** Wang Meng; Wang Meng's later novels; mentality of novel creation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可谓是学界研究的重镇,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是王蒙小说文体的研究。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文体研究只局限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而少有深入形式背后的思想文化及作家心理深层机制的。”<sup>[1]</sup>因此,把握作家话语背后的创作心态才是解读作品深层意蕴的关键。笔者在认真阅读了王蒙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之后,认为他后期小说创作(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背后有这样三种心态:智者心态、长者心态和史家心态。分析这三种心态在他的创作中具体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理解王蒙内心的孤独与惆怅。

## 一、人生的智者心态

古希腊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智者学派”,极擅长论辩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者形象老庄也具有善于思辨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蒙后期的小说创作正吻合了这一特点。这背后潜藏着作家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洞明世事之后的清醒与觉悟。进入1990年代以来,王蒙在竭力表现自己的“智者”形象,从“季节系列”到《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的写作,以及近几年陆续出版的三部自传似乎都在建构这样一种“智者”的写作风格。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0-05-25

作者简介:尚新磊(1985-),男,河南安阳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究其原因,王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背景,他早年热衷于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又一度沉寂于边远的新疆地区,“故国三千里,风云二十年”,1980年代出任过国家文化部长的要职。这样丰厚的人生阅历培养了他深邃的心智,“他的背景、地位、创作实力,使他成为当代少有的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人生的文人”。<sup>[2]</sup>孙郁用“居高临下”这一词正生动地点出了王蒙言语的心态特征,事实上在他后期的小说话语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到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他经过岁月历练之后心智的成熟以及智者的心态使然。

王蒙的智者心态集中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感情姿态上。他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我们耳熟能详的天经地义是‘世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sup>[3]</sup>他在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的言论颇能代表了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他看得更多的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变异与猥琐:高来喜要做“骗净了”的良民,米其南在新时代里沉沦于疯狂的肉体补偿,杨巨艇只是高谈阔论的不实之徒,“四人帮”倒台后,下放回来的袁达观揣了两部立场相反的书稿来投机,自称“怎么也难不倒咱们”,可以说王蒙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持一种蔑视与批判的态度。王蒙内心并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标高,他批评萧连甲说“熬”过来就“胜利”了,带有规劝的意味。在《青狐》中他借王模楷的话说:“而中国,老百姓很机灵……而知识分子精英们却动不动犯傻,动不动批判那个不应该批判的,追求那个不可能实现的,丢掉那个好不容易积淀的。他们崇尚大言,赞叹乖戾,轻蔑常识,向往爆破,勇于内斗,与人为恶。他们动不动煽情,动不动亮相——精神健美秀,祭起条条当法宝,急于求成而又气急败坏,硬是不了解名词概念与事实的区别,大地与云端的区别,今天与昨天的区别,望文生义,对世界也只是一知半解。”简直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得一无是处。在王蒙的视野里知识分子的愚钝就是不识时务,“走了那么多弯路,做了那么多蠢事,即使是一头驴也该学聪明一点了。”这样侥幸的心理渗透着王蒙自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有人指出:“王蒙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却对体现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启蒙思想一直缺乏深刻的认同感。这就是他产生了一种身为知识分子却又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心理。”<sup>[4]</sup><sup>113</sup>其实,这并不奇怪,王蒙一贯的智者心态使他缺乏真正知

识分子的道义精神,即使有一些批判与反思也显得犹疑与徘徊,缺少坚强、独立的精神支持,他不具备萨义德所言的那种独立、批判一切专制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而是带着一种明哲保身的规劝色彩,因而这种立场的暧昧总是给人以狡黠之感。王蒙自己的处世哲学限制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应有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他的作品里往往缺乏一种真正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而流于一种深谙人情世故的“智者”型处世心态。

## 二、孤独的长者心态

王蒙虽然以“智者”的心态投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但是在其文本内部还是渗透着浓厚的情感体验,他后期的作品中长者心态的流露正显示了他自身的性情,并潜在地制约着其小说叙事。

长者心态突出的表现在他对代际隔膜的认识上,他看透了代际隔膜所隐含的悲哀,由此演化出王蒙作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儿子和父亲”的主题。“在中国,儿子永远也不会原谅父亲。”这是王蒙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总结出的一个深刻命题,这个问题几乎贯穿在他的全部创作中,而在他后期的创作中体现更为深沉。从早期《青春万岁》中的洪无穷和他的母亲,到《蝴蝶》中的张思远和他的儿子冬冬,《活动变人性》中的倪吾诚与他的儿子倪藻,“季节系列”中的钱文和儿子钱远行,两代人之间总有一种悖反的矛盾,这成为王蒙叙事话语中一条潜在的情感线索。这个母题与王蒙在自传中透露的与父亲不和谐的关系有关,但是越到晚年,他的情感体验越趋于“父亲”不被理解的一面,这显示了王蒙情智与心态的成熟。

在《踌躇的季节》里,他借犁原的事例进行代际反思:“包括犁原和他们那一辈人的痛苦与牺牲,在某些人看来是徒劳的,昏乱的,盲目的与自作自受——叫做‘活该’的。”王蒙看透一种代际之间传承的悲哀,父子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只有等到孩子成了父亲的时候。然而年轻时候这种父子间的争执又必然是绝对的,正如冬冬对他的父亲张思远所说:“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张思远不仅与儿子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和比他小十几岁的妻子海云,他要面对的也是一条走向毁灭的路,为此他要像涓生一样承担对妻子

死去的忏悔与自责,带着心灵上沉重的伤痛。

代际间的隔膜使两代人不能面对共同的历史问题,于是两代人之间的辩驳成为不同立场间难以调和的争论。儿子说:“我们也愿意作崇高伟大的一代人,像您们一样,作披荆斩棘的探求者,开路者,创业者。但是您们只要求我们、只允许我们作守业者,作接班人,只允许我们顶替你们的位置,要求我们走在您们的脚印上。不,那是办不到的。”父亲则说:“你不是真空,中国不是真空,历史不是真空。你们不能从钻木取火开始。你们既不了解国情又不了解历史。靠你们的那些皮皮毛毛的见解只能误国误己,头破血流。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革命是几代人的事业。接班丝毫不意味着墨守成规……中国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胀。”每代人都有一种面对历史的自信,王蒙将两代人的问题拔高到国家、历史这些宏大的层面,而在此已不再年轻的王蒙的情感显然倾斜在作为父亲的年长一代人的身上。

长者心态在后期更体现在王蒙对自我的理解上,表现为一种惺惺相惜的暮年之悲。“包括到‘季节’系列作品中,王蒙会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投身于作品的情景之中,沉溺于浓重的感伤和情感抒怀中不能自拔。”<sup>[5]</sup>在“季节系列”里,王蒙对晚年犁原的表述无意中吻合了自己的“身世之悲”,我们不难从他这样的阐述中体会到一些别样的意味:“一个大有作为的老人,一个猛志常在的革命者,一个一半是文艺官员一半是文人的有时候左右逢源有时候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的可怜人的悲哀。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其实已经被一些年轻人轻视、厌烦、嘲笑乃至从精神上举行了葬礼。他自己还在辛辛苦苦的做着已经做了几十年的他认为唯一正确、已经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事……但是青年们未必那么欢迎他,在一片青春的喧哗中,重新响起一个只不过那么几句话几个词,已经说了一辈子的老人的絮叨,这使他们心烦。”在此王蒙显然是有感而发,不免流露出些许的暮气与怨气了。

在后期小说创作中,王蒙的情感视点不断转化,从犁原到钱文到更年轻的一代的读者,王蒙的孤独情感逐渐溢出了文本之外,他的思考延伸及当下的现实,更指涉了他自身。他一方面自嘲“一切都是徒然的瞬间”,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要被下一代人嘲笑与误解,于是叙述中痛心交织着指责和愤然。王蒙在犁原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更多有关个

人际遇的感慨,而作为代言人的钱文从犁原的死想到了自己,仿佛看到一个人的死自己就死了一回。在此王蒙插话道:“你们不能真个理解犁原这样的人,然后同样的命运立即会降落到钱文这一代人身上。”王蒙终于把视点转向了自己,道出了书写在此的惆怅与孤独,而且还具有一种对年轻一代告诫的意味。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潜在的对话,显示出王蒙居高、沉重的长者心态。

### 三、沉重的史家心态

智者心态与长者心态分别从理智与感性层面影响着王蒙后期小说创作的叙事话语,当这两种心态交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又衍化出一种沉重的史家心态,使他的内部出现了分裂,让他不知所从。

从1992年到1999年,王蒙陆续出版了他的“季节系列”:1992年《恋爱的季节》、1994年《失态的季节》、1995年《踌躇的季节》、1999年《狂欢的季节》,这四部作品堪称从个人际遇出发描述历史变革的史诗性作品,透露出作家的史家心态,这源于王蒙身上沉重的历史负载感。王蒙早年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结及后来极左时期的历史遭遇,使他对那个时代的叙事迟迟不能忘怀,在某种程度上,这已形成他小说文本最浓厚的叙事资源,是他追忆、反思与超脱的精神起点。在1990年代的新时代语境里,王蒙虽然一方面标彰“躲避崇高”,作出投合世俗的姿态,反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但沉重的历史负载感让他的书写并没有泯灭那种“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sup>[6]</sup>沉重的史家心态使他的写作在“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社会里并非显得游刃有余。面对自己在阅读市场中的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境况,晚年的王蒙在无奈之中流露出令人不能理解历史的悲哀。对此有人说:“在政治冷淡症广泛流行,‘告别革命’的呼声高涨的九十年代,王蒙一方面在理智上与这一时代主流保持同调,对世俗化、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沉入了对往昔革命政治时代刻骨铭心的情感回忆之中。”<sup>[4]105</sup>王蒙一方面要面对沉重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这种历史不能被人理解的悲哀,就像巴金在1980年代以后仍迟迟不能忘怀“文革”沉重的教训和心灵上的苦痛一样,王蒙成了当下文

坛上的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在他汪洋恣肆、长篇大论的另一面,我们听到他“字里行间的沉重的叹息声”,<sup>[7]</sup>历史负载成为王蒙难以化解的精神负担,他的书写充满了表意的焦虑。

《青狐》作为“后季节系列”的重要篇章,虽然一改先前王蒙叙事的很多形象和特点,但是王蒙潜在的历史意识与这种世俗的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虽然《青狐》某种程度上还延续着“季节系列”中历史叙述的思路,但是已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出现了一些大众化的姿态,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掩饰和消解,在此我们看到王蒙自身的分裂:妥协还是坚守?单纯从《青狐》没有延续“季节系列”的叙事模式来看他似乎是妥协了,但是脱去《青狐》的故事外衣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季节系列”那种熟悉的操纵历史的思路。王蒙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历史叙事语境:在21世纪这样一个价值虚浮的年代,他的历史叙述将由谁来倾听?如果历史没有人来倾听,历史叙事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那么历史叙事的意义又何在呢?对此他显然是矛盾的。在后革命时代王蒙面对的是两个不能对话的世界,他的历史焦虑心态只能分身到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中来缓解,可是倾听者又是谁呢?温奉桥说:“这种由于王蒙思想的超前性而带来的与同时代的无法通约与‘对话’,使王蒙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寂寞的孤独者。”<sup>[8]</sup>与其说无法对话是因为王蒙思想的“超前性”,不如说是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环境已经消解了王蒙历史叙事的阅读空间。在此王蒙真的成为迟迟不忘历史叙事的“孤独者”,难怪他在《青狐》的结尾,还要不无感慨地自语说:“而我们熟悉的一些人和事,都变得愈来愈成为记忆——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回忆了。也许,人们愿意生活在没有记忆的快活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认识:鉴于王蒙后期小说创作的情况,智者心态、长者心态与史家心态已经构成了王蒙一套成熟的创作心态结构,并操纵与制约着王蒙小说的话语与叙事。智者心态使他不自觉地降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长者心态使他看透了代际隔膜的悲哀,而沉重的史家心态则使他的书写在当下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从高昂到低沉,从“话语的狂欢”到“表意的焦虑”,王蒙的话语心态日趋变得沉重,他的内心充满了孤独与惆怅,在“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社会语境里,谁来倾听王蒙?怎样延续与发展自己的革命历史叙事?晚年王蒙的写作正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以后他的创作将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关注王蒙的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郭宝亮.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 [2] 孙郁.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J]. 当代作家评论,1997(6).
- [3] 王蒙.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 东方,1994(5).
- [4] 徐向昱. 王蒙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潮[M] // 温奉桥. 王蒙·革命·文学——王蒙文艺思想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 贺仲明,戴俊艳. 论王蒙创作的精神资源[J].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 [6] 王蒙. 躲避崇高[J]. 读书,1993(1).
- [7] 温奉桥. 欲望叙述及历史悖谬——读王蒙长篇新作《青狐》[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1).
- [8] 温奉桥. 后革命时代诗学——王蒙文艺思想散论[J]. 当代作家评论,2007(2).

责任编辑:黄声波